

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次 屈原学术讨论会观点综述

徐 少 舟

端阳佳节,江陵城里,中国屈原学会成立大会暨第四次屈原学术讨论会召开了。大会八五年六月二十一日开幕,二十五日结束,历时五天,共有全国各地代表二百余人参加,收到论文百余篇。日本东京早稻田大学教授、南开大学东方艺术系兼任教授、北京大学考古系交换研究员稻畑耕一郎也出席了会议。

这次大会,是继八二年的秭归会、八三年的大连会,八四年的成都会后的又一次全国性的屈原研究的盛会。与会代表们济济一堂,切磋研讨,大会发言,小组讨论,分别就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屈原的生平及其著作,屈赋的艺术成就,有关屈原及楚辞的综合研究,楚辞和楚辞研究史这五个专题,畅所欲言,各陈己见。

关于屈原的爱国主义问题,是这次大会争论得最为激烈的问题。归纳起来,有三种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认为,屈原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诗人,对他的爱国主义思想应作充分地、历史地肯定。如果否定屈原的爱国主义思想,就等于否定了屈原。

另一种意见认为屈原并没有爱国主义思想,他的“爱国诗人”桂冠是后人加上去的,所以,充其量只能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屈原是一个没有爱国主义思想的“爱国诗人”。理由是:

(1) 在先秦,人们心目中的“祖国”便是“天下”,世界在当时的人看来,并没有中、外之别。因为其时各民族已经统一起来了,三皇、五帝、天下,已成为一个总体。许多

儒家大师的思想体系,也都是建立在“天下”这个基础之上的;

(2) 从先秦的许多人(例如孔子)来看,他们的言行并不受一个“国家”的拘限,并不受“爱国”的影响,他们的很多举动,往往是从个人的利益出发的;

(3) “忠君”的行为并不能算爱国的体现;

(4) 先秦典籍中,并没有“爱国”观念的记载。如《论语》中有七、八处有关各种道德标准的记载,但偏偏没有“爱国”这一条;

(5) 不能从屈原作品中所叙述的他的言行来判断他是否爱国。因为当时没有这种观念,他的言行并不是在“爱国”观念的支配下产生的。孔子、孟子周游列国,并没有人说他们叛国,而屈原闭关自守、不离楚国被说成是爱国也显然不确;

(6) 从“伍子胥事件”看,从诸家对伍子胥的评价来看,也可证明当时并没有“爱国主义”的观念。伍子胥身为楚人,因其父奢被楚平王杀害,故弃楚而奔吴,并与孙武共佐吴王阖闾伐楚。五战入郢(楚都),掘平王墓,鞭尸三百。对于这样一次事件,诸家评价并没有斥伍子胥为卖国的。相反,给予他的多半是歌颂与同情(包括屈原也是如此)。由此可见,其时并没有“爱国主义”的观念。

总之,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屈原失志时不离开楚国的主要原因是他具有浓厚的宗族观念与乡土观念,而我们以此来证明屈原具有爱国主义思想是不正确的。但是有一点需要说明,说屈原没有爱国主义思想,并不

意味着对他的贬低,而只是要还其本来的历史面目;屈原之所以对后世产生巨大的影响,也决不仅仅是因为他具有爱国主义思想。

除上述两种意见外,还有一种看法,认为屈原有没有爱国主义思想这个问题是争论不清的,我们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不如模糊一点,只要知道屈原有爱国思想并承认它对后世的影响便够了。免得在一个暂时争论不清的问题上徒然浪费时间和精力。

关于屈原的生平和著作这个问题,代表们也提出了许多新的见解。特别是对所谓“屈原否定论”以及胡适的“屈原是一个箭垛式人物”的论点,许多代表作了多方面的辩驳。他们认为,虽然现存的《史记·屈原列传》中有许多疑问和疏漏之处,但这并不能成其为否定屈原存在的理由。当然,我们也不要“保卫屈原”的提法,因为这样说基础不牢。另外,关于屈原的生平,屈原被流放的时间和次数,《远游》的著作权问题,《招魂》的性质问题,以及其它一些具体字词篇章的考证等等问题,也有一些不同的意见。如对《远游》的著作权,一种意见认为它不是屈原的作品,因为这部作品中的游仙思想和其它一些记载很明显是要到西汉时才有的。而另一种意见则认为,屈原时代便已有游仙思想,屈原不仅是一个诗人,而且也是一个哲人,像《远游》这样的作品,非屈原是写不出的。至于其中有些记载,可能是后人的窜改或错简。再如《招魂》的性质问题,有人认为是招楚怀王的生魂,有人认为是招怀王的死魂,还有人认为是屈原自招。

关于楚辞艺术特色的讨论,也是这次大会的一个重要议题。有的代表运用系统论的方法,从整体上考察《离骚》,觉得《离骚》的结构应分为前、后两部,其中存在着“虚实相生,阴阳对转”等艺术辩证法的规律。《离骚》的结构反映了先秦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还有的代表则对司马迁以来的有关屈原作品研究中的比兴说进行全面考察,得出屈原的作品是“诗体的寓言”(或“寓言诗”),屈原是我

国第一个寓言诗人,是我国的寓言大师这一结论。并从这个结论出发,把屈原的作品分为三类:①全诗均为寓言的,如《桔颂》、《卜居》、《渔父》等。②其中包含着可自成段落的寓言诗的,如《离骚》、《思美人》、《远游》等。③仅运用了寓言手法的诗句。另外,对《九歌》的艺术结构,对楚辞的美学特征,对《离骚》的抒情主人公形象等,代表们也作了较为详细和新颖的论述。

这次大会上最令人感兴趣的议题是有关屈原及其楚辞的综合研究。有的代表运用比较文学研究的方法,把屈原的《离骚》和但丁的《神曲》进行对比,找出它们之间的同异,并进一步探究产生这种同异的历史原因。还有的代表提出,要把《楚辞》、楚文化放在四大集群(即东夷、西夏、南苗、北狄)文化,乃至太平洋文化的广阔背景之前来研究,认为楚文化是我国上古文化比较晚起的一支,它是四方百族丰富多彩的文化在长江中游、江汉平原交流汇聚的光辉成果。我们只有把楚文化、楚辞文化放在广阔的人类文化背景之前,尤其是放在相生相克的邻近系统和亲缘文化的系列之中,才有可能破译它素称难解的“密码”,才能“显现”或表述它们貌似平常,实则奇奥的“潜信息”。另外,也有代表认为,如果把楚文化背景下的楚辞研究进一步扩展成为整个战国文化背景下的楚辞研究,则可以认识两个问题:①《诗经》到《楚辞》的变化,是伴随着多元的战国文化发展的潮流而变化的。②《离骚》空前乃至绝后的长篇体制,是多元的追求宏丽奇伟的战国文化风格在诗歌领域的表现,其时的宇宙观以及建筑、音乐等都可说明这一点。总之,有关楚辞研究的方法论问题,代表们普遍对综合研究比较感兴趣。如思维空间的拓展与多元的、广阔的文化背景的综合考察,比较研究与交叉研究,传统方法与新方法结合运用等。

除了上述四个议题外,代表们对楚辞和楚辞研究史这个问题也提出了许多宝贵的看

(下转116页)

